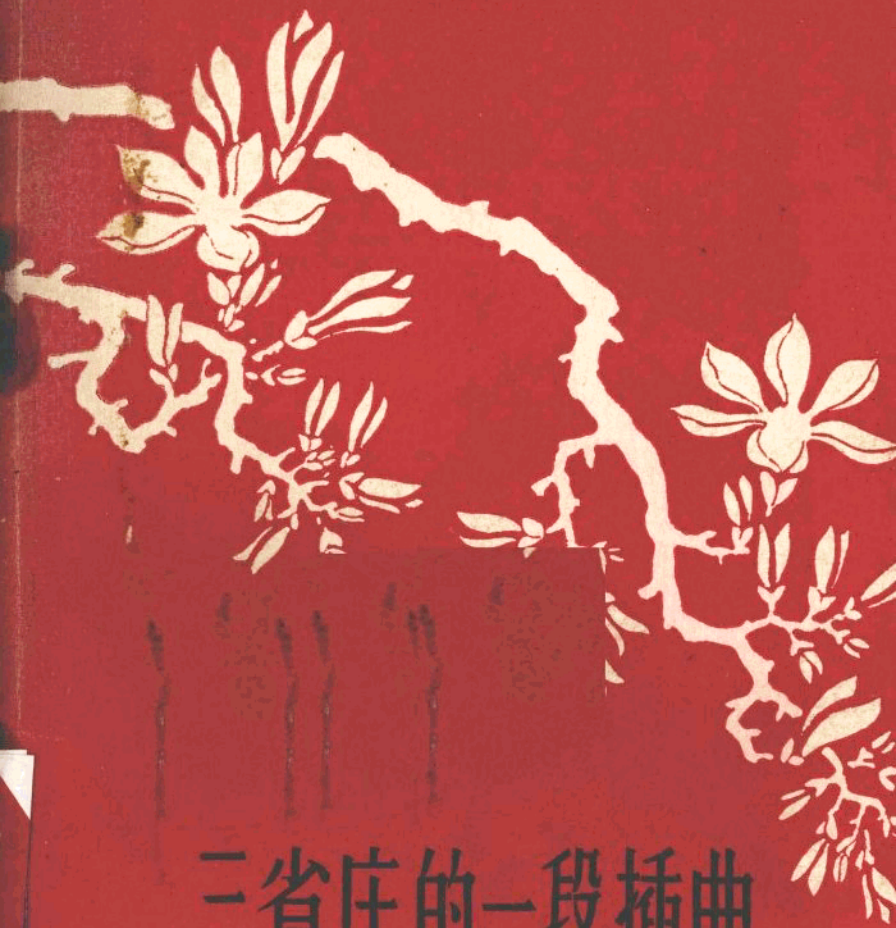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省庄的一段插曲



前 言

为了滿足农村讀者閱讀需要，我們編輯了一套农村文艺丛書，其中包括短篇小說、詩歌、演唱等。

这套农村文艺丛書，着重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农村生活。其中有很多作品描繪了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，歌颂了他們爱集体、爱国家、爱社会主义的高貴品質，以及他們向各种困难作斗争的坚毅风格。这些作品不僅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內容，而且通俗易懂，适合农村讀者閱讀。我們希望广大农村讀者喜爱这套丛書，特别是希望大家讀过之后，能从中得到启发和鼓舞，更加热情百倍地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。

我們編輯这套丛書还是初次嘗試，怎样才能編得更好，更适合大家的要求，希望大家多多提供改进意見。

目 录

互作鉴定	赵树理 (1)
三省庄的一段插曲	陈登科 (31)
特别奖励	肖 马 (52)
柳 笛	潘永德 (68)
圆月酒	海 涛 (73)

互 作 鉴 定

赵 树 理

光明公社第三大队第一生产队队员刘正，給县委会李书记写过这样一封信：

李书记：

我是咱们县立第二中学去年暑期毕业的一个初中毕业生，毕业后回村参加了农业生产工作。我知道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参加劳动生产是光荣的，是有前途的，只是我还是个今年才满十八周岁的孩子，很需要有人加以培养、教育，給以帮助。眼前我所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，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角落——同学们排挤、讽刺，队长打击，周围的人对面冷眼相看、背后挤眉弄眼……这样冷酷的地方，我实在待不下去。

李书记！你是不是会以为我的神经过敏呢？不！

这不是我随便猜想的，有以下事实为証：

我才上了几年初中，知識有限得很，因此便想找机会学一点在生产上真正有用的知識。这难道也是錯的嗎？和我同时毕业回到村里来的連我共有四个人，他們三个也同样有这个想法。去年有两次学习的机会（一次学养蚕，一次学开鍋駝机），我們四个都报过名，其中有两个因为父亲是干部，被派去了，我和一个名叫陈封的同学沒有被选上。我說队长有偏心，队长就召集全队的人开会批評我，說我不安心劳动，光想往外走。最可恨的是陈封——他同样和我提出学技术的要术，同样和我沒有被选中，等到队长說我不安心的时候，他为了在队长面前討好，也說我不安心。在会上数他发言次数多，攻得我也最猛烈。

我爱学着作詩，难道也是錯誤嗎？陈封在这一点上也諷刺我，叫我詩人，引得大家都叫，叫我受不了。他并且作着詩罵我說，“象一条水龙呀，冲向你自己的屁股。”

我要求在大队的蜂場学养蜂，大队批准了。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，蜂螫了我的头，副业主任和他的女儿幸灾乐祸，看見許多蜂落在我的头上也不管。第二天，他們說我不会管理蜂，調我帮着修理蜂箱

的木匠拉大鋸，一拉就是半个月。我觉着光拉大鋸也学不会养蜂，才又要求調回生产队去。这明明是副業主任父女們想包办蜂場，排挤別人，可是等我把这情况反映給大队长，大队长又听了副業主任一面之詞，批評了我一次。

今年春天澆麦子时候，在安裝鍋駝机那一天，分配我的工作是清理渠道上的树枝。我把我應該做的工作做完了，可是夜里記工分只給我記一厘——就是一个劳动日的百分之一。因为大家都在挤我一个人，我一时說不过他們，就說“我情愿白尽义务，不要工分”，大家說“不要也不行，一定要記上一厘以作紀念”，并且把这“紀念工分”发表在第二天的黑板报上。恶毒的陈封，又得到了新的諷刺資料，把“詩人”那个称号的头上又加了“一厘”二字，叫我做“一厘詩人”。

不举例了！我在这里遇到的受气的事，写起来一个月也写不完。李書記！你看这样环境能活人嗎？周围的人都象黃蜂一样，千方百計地創造着刺人的方法来刺伤我的心灵，怎么能叫我忍受得下去呢？

李書記！我用几乎絕望的声息向你呼吁，要求你救我脫离这黃蜂窩。我情愿到县里去扫馬路、送灰渣……作一切最吃苦的事。我什么报酬也不要，

只要你能把我調离这个地方，就是救了我。

李书记！我以后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封信上了。你能答应我的請求嗎？急待你的回音！謹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礼！

光明公社第三大队第一生产队

最可怜的队员 刘 正

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

他把这封信用双挂号办法发出去，第三天便接到了盖有县委收发室公章的回执。他想：“石子扔到河里，大小总可以听到个响声；信既然交到县委，早晚总会有个結果。”他开始虽然想得这样从容，可是又隔了两天就着了急，跑到公社的邮寄代办所打听有否回音——自此每天一趟，一連跑了三四次。同学们見他每天往公社跑，誰也不知道他跑得为什么，私下免不了作为个研究的题目。陈封問过他一次，引起他一陣反感說：“你管得着嗎？”

就在这天下午，生产队长和他說：“明天要开始鋤谷苗了，閑工誤不得了！在鋤苗期間，有事出外村去，一定得請准假再走！”他一边答应着，一边还以为是陈封在队长跟前告了他的状，便和陈封恼起来，連話也不說了。其实陈封沒有告过他的状；公社离这个大队十多里，去一次要誤一大晌，一个人无故几晌不出工，不用

說瞞不过队长，就連每个队员也都会觉察出来。

刘正就这样勉勉强强鋤了三天苗。第四天早飯后，大家正在出发的时候，他便向队长来請假，說他的关节炎犯了，两个膝盖疼得蹲不下去，要到公社卫生站去看病。队长还没有答話，几个青年妇女格格格地笑起来，其中一个嘴快的說：“鋤苗的开头几天，膝盖还有不疼的？”陈封說：“恐怕是你們的关节炎都犯了吧？怎么沒有听见小南院爷爷說疼？”說着指了指旁边一位花白胡須的老人。刘正翻了陈封一眼，又向队长說：“队长！我是向你請假的，別人管不着这事！你准不准我的假？”队长見他毫无自覺性，便向他說：“你叫我怎么說好呢？民主一下好不好？”刘正見这情势，知道自己占不了便宜，就和队长耍起无賴来。他說：“队长是大家当呀还是你当？”队长見他这样不識好歹，便板起面孔向他說：“队长自然是我当！这次假我不准！”“难道不准人腿疼嗎？”“就因为一天跑一次公社把你的腿跑疼了！不让你去是爱护你！”“謝謝吧！俗話說‘皇帝还不使病人哩’！我不能上地！”大家見刘正这样无理取鬧，都有点不耐煩了，用不着队长說話，就你一言我一語地頂住了他——“去不去隨他的便吧！哪里在乎他做那一点？”“快找大队长把他調走！咱們队里放不下这种貨色！”

正爭吵間，忽然聽到汽車馬達聲。“噓——汽車！”
“還是咱的鍋駝機响！”“不！你听！”大家正猜測着，
馬達聲越來越近，不一會一部吉普車就停站在大隊辦公室門口了。大隊長、支書都來歡迎客人。

突然感到喪氣的是劉正：他認識這部汽車是縣委會的，因為本縣只有這一部吉普車的帆布蓬子是綠色的。由於車子，他聯想到車里坐的人可能是李書記，而李書記來了一定要談自己的問題，而自己又剛和隊長吵過架，而……越想越不妙。大家見汽車停下了，不約而同地湊近來看來的是誰，劉正也無精打采地跟了過來。

客人下車了，大隊長和支書迎上來和客人握手。劉正見來的不是李書記而是王書記和生產辦公室的一個人，才放了心，——因為按縣委書記們的分工，王書記是管農業生產的。他一位名叫陳茵的女同學叫了他一聲，然後放低聲音努着嘴說：“看！‘土頭土腦……’”沒有等她往下說，劉正就躁着腳也向她低聲說：“我揍你！”

劉正為什麼着急呢？有这么一段小故事：前年他還在二年級的時候，學校里請王書記去給他們全體同學講“學生參加勞動鍛煉的重要性”，講過之後在討論的時候，他說過怪話。他說王書記是“土頭土腦，小天小地，沒有大志，只懂種地”。當時陳封說：“這是你給王書記作的鑑定嗎？”他吐了吐舌頭。有人把這話告訴了班

主任，班主任組織全班同学和他辯論了一次，都說他看不起劳动，侮辱党的领导人。他的同学陈茵，便是引用这桩旧事来和他开玩笑的。

生产队长简单地和王書記打过了招呼，回头便領着本队的人往地里去，沒有再理刘正的碴。刘正这时候有点为难：他虽說看不起王書記，可也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无組織无紀律的行为嚷嚷到王書記的耳朵里；有心跟大家一块去吧，自己是来請假的，手里沒有拿工具；还没有想到該怎么办，队长就帶着全队的人走远了。他歪着头又想了一陣子，最后覺着还是去者为妙，于是就回家拿上了小手鋤随后赶到地里去了。

王書記是从公社吃了早飯来的，略休息了一下就和大队干部相跟着去看生产。

他們先到养蜂場，見几个妇女正掀着箱盖往外提框子。党支书向一个妇女問：“你爸爸哩？”“搖蜜哩！”支书听了，就領着大家走进搖蜜的房間里——因为进来了好几个人，就有十来个蜂跟着飞进来；人刚刚进完了，一个青年妇女搶了一步过来把門关上。大队长指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向王書記介紹說：“这位就是副业主任！”王書記向副业主任去握手，副业主任拱了拱手說：“手上有蜜！”支书又指着关門的那个青年妇女說：“这是我們大队的团支书。”这位被介紹的人自己接着

說：“王書記你好！我認識你！我叫李耀華，在县里一中上过学，听过你的报告！”“几时毕业的？”“前年！”“在村里待得慣嗎？”“怎么待不慣呀？我就是在这村里长大的嘛！”副业主任說：“不止待得慣，这是我們这蜂場的台柱子！”王書記轉向主任說：“蜂場上几个人？”“六个！”“几个女的？”“除了我全是女的！”大队长說：“他是老师！”主任謙虛地說：“什么老师？解放以前我不过在省城里卖水，后来在裕华蜂厂当过几年工人。如今青年們已經比我懂得的多了！”王書記又問：“你們的副业一共占几个人？”“养蚕归各生产队經營以后，大队的副业就剩这个蜂場了。还有两个木工，除照顧蜂場用的傢具以外，还管修理各生产队的农具，收入合并在这里算賬。”“每年共有多大收入？”“沒有灾情的話，能見万把块钱的純利；这二年因为天旱花少，才能落两三千块钱！”王書記略为思忖了一下說：“这倒是个便宜事！一共才占八个人！”队长微笑着說：“这是我們村里的小搖錢树！群众对这事兴趣可大哩！”提蜜框子的人走进来，王書記說：“你們工作吧！不打扰你們了！”說着便和大队干部們走出来。

他們走过一条水渠，見滿渠的水正向菜园子里流着。王書記說：“看看你們的鍋駝机去！”他們走到小河边，見半条小河已經被堵截住，堵成了約有二三亩大一个水

潭。靠岸的一边，岸上有座新房子，马达声从房子里传出来。这便是鍋駝抽水机所在的房子了。王書記指着渠道說：“这好象是一条旧渠道，渠道边的树都长这么粗了。”支书回答說：“十年了！这是一九五一年安装解放式水車时候开的！”說着話便走进房子里。还没有等介紹，管机器的姑娘便向王書記打招呼說：“王書記！你好！”王書記答应着，并且問她的姓名。她說：“我叫李晚秀，二中学生！”“几时毕业？”“去年！”“机器好用嗎？”“好用！”“每天开嗎？”“不！不缺雨的时候不开！”“那样子怎么計算工分呢？”“开一天記一天！”“不开的时候呢？”“回生产队生产去！”

“别的活你也会做么？”“不会做的就学习嘛！”“和你同时毕业回村里来参加农业生产的有几个人？”“四个人！”“在不在一个生产队里？”“我在第二队，他們三个在第一队！”“你父亲是干什么的？”“也是种地的。我們的家庭全是庄稼人。”“你父亲是干部嗎？”

“是我們二队的副队长，不脫产干部。”“他們的家长哩？”“有两个是干部——陈茵的父亲是党支部副書記，也不脫产；陈封的父亲是大队会記，一年補貼二百个工。”“你們回村来生产，你們的家长都乐意嗎？”李晚秀想了想說：“这主要得看我們自己——只要我們各人自己安心，家长們不会有多少意見，就是有点意見也

好說服。”“你們自己都安心嗎？”李晚秀笑了。停了一下她回答說：“大体上都能行，不过我可不能完全代表別人！”支書覺着她這話說得很準確，滿意地微笑了一下，順便看了一下汽壓表說：“小鬼！添得火了！”王書記說：“好！希望你們安心生產！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全部家當，將來都是你們的！”說着就返身走出來，同來的人也都跟着離開了這座新房子，去看渠道的分布。

接着他們便到第一隊的谷子地里看鋤苗。一隊的青年們見王書記來了，老遠就鼓着掌喊口號：“歡迎王書記！”劉正見王書記到地里來，暗自贊賞自己剛才決定的英明。他想要是使性子不來的話，陳封這陣子一定會在王書記面前譸訟自己。他在这种滿意的心情支持下，做活也就加了點勁兒，看去還象個有突擊性的青年。大家向王書記打招呼，王書記說：“你們鋤吧！我隨便看看！”大家就都又恢復了工作。陳封說：“我們幾個學生是才學鋤苗，鋤不好，請你指導！”“你也是個初中畢業生嗎？”“是！”王書記說：“不要着急！莊稼活兒只要能安心做，慢慢做着就都做好了。”跟在劉正後邊鋤的就是那位花白胡須的老人。他看着劉正鋤的那兩壟苗說：“小正今天的活兒做得能行！”陳茵开玩笑說：“這是我們的詩人大躍進了！”陳封突然地問王書記說：“王書記！聽說你會治關節炎？”他這一問，引得一伙

青年們格格大笑，几个妇女笑得接不上气来、倒在地上。王書記看得出他們是开玩笑，还没有来得及反問，就見队长一本正經地站起来斥責陈封說：“小封！你怎么什么时候也开玩笑？不要鬧了！对着上級領導同志一点規矩也沒有！”“是！不鬧了！”陈封痛快地接受了批評，大家又都好好干起活来。王書記看了一陣，就和大队干部相跟着往別处去了。

下午，上地去的时候，一队长向刘正說：“今天下午你不要去地了，县委王書記要和你談話！”

这一通知，使刘正想到是有人把他上午和队长頂撞的事反映給王書記了。他想：“这究竟是誰反映的呢？最大的可能是陈封——他在地里問王書記会不会治关节炎，难道不是想把这事透露給王書記嗎？在地里，他的話被队长打断了，难道他在睡午覺的时候不会再去找王書記談嗎？也可能是队长——不要看他在地里不讓陈封說下去，他可能覺着那样开着玩笑說，不如他用队长的身分告状来得有力量。陈茵哩？也有可能！別人哩？可能反映的人太多了！全队里几乎誰也是仇人！誰也不会替我說好話！不論是誰吧，事情既然反映上去了，就得想对策！”至于“对策”，他也想了好多。他以为这不能“主观主义”，要看对方的状告得輕重和王書記对

这事的态度——要从“客观情况”出发，不过“原则”一定要“坚持”——坚持自己“真有”“关节炎”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他以为这也是“馬列主义方法”的运用。

刘正运用了一阵他的“馬列主义”之后，还不見王書記打发人来叫他談話。他着了急，亲自到大队办公室找王書記去。他以为这也是“爭取主动”之一法。找到王書記了，王書記正和大队长談話，要他暫且回家去等一等。他走出大队办公室，觉着情况对他更不利了——他觉着大队长一定在王書記跟前败坏自己——因为他也和大队长頂撞过。他以为大队长的話既然說在前边了，自己已經准备好的对策就該有所修正。修正过对策之后，还不見有人来找，就又一次“主动”地找到大队办公室，可是王書記和大队长的話还没有談完；一連“主动”了好几次，都是如此，气得他放弃了这种“主动”回房躺下，繼續考虑他的“对策”。

一会，听見院里有人問刘正，他媽媽答应說在西房里。他从窗上看見是王書記来了，就很有礼貌地出来迎接。他把王書記迎进房里去，讓在自己的书桌旁坐下，然后給王書記倒了一杯水，自己才坐下。他說：“对不起，劳你亲自找得来！你只要打发人叫我一声好了！”王書記說：“没有什么！到你們家来玩玩不很好嗎？”坐定之后，刘正靜待王書記先开口。这时候他反而不愿

意爭取主動。他以為王書記先說有兩大好處：第一可以知道是誰的原告，狀告得重不重；第二可以看出王書記對這事的看法如何。

王書記果然先開口了。他說：“聽說你們去年畢業的同學們，在村里團結得有點不夠好，我想把你們召集到一處，讓你們彼此談談心。現在先跟你個別談一下，看你有什么意見！”

王書記這一提，使劉正感到自己遇上了最大的幸運。他想：“這狀一定是陳封告的，可是王書記沒有全信了他的話，反而覺着是他和我有意見想借機會攻擊我。只是要集合同學們到一處談起來，沒有我的便宜——誰也不會替我添好話。怎么办呢？我還是先攻擊他們，說他們都對我有成見！”主意拿好，他便向王書記說：“王書記呀！團結不是一方面的：人家每天都在圍攻我，我怎么去和人家講團結呢？”說着便哭了。王書記說：“不要激動！正象你說的，‘團結不是一方面的’，只是自己考慮這問題的時候，不要只考慮自己有理的那一方面。‘圍攻’這個字眼兒還是不要亂用的好！他們又不是敵人，為什麼偏愛‘圍攻’你哩？‘從團結的愿望出發，經過批評，達到新的團結’這個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，到你們名下難道就不適用了嗎？所謂‘批評’，就是找不團結的原因。這原因也許在兩方面，也許在一方面，不過在

自己考虑的时候，最好是先考虑自己应该作自我批评的一方面——那样才便于主动解决问题！”

王书记讲这一段话，出乎刘正意料之外。他以为雇工出身的王书记只会讲“劳动生产的重要性”，怎么还会挑字眼哩？他以为象“激动”呀，“公式”呀，“适用”呀，“所谓”呀：这些词头只有上过学的人才会有，“土头土脑”的王书记为什么还会用得那么恰当呢？他想：“这个人象我以前估计的那样简单，说话得小心一点！可是话总得说，要把给李书记写的信上的内容都说上，最后说明这地方再也不能待下去，要求他在县里给找个工作，不要在这里召集什么讲团结的会！”想罢，便开始按照计划讲起来。他讲到春天安装锅驼机时候的例子，特别补充说自己有关节炎不能下水，并且联系到当前说：“这病现在发展得更严重了，想去治一治，在队里也请不准假！”讲到要求王书记给他在县里找工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什么都行！我绝不讲价钱！再苦的事我也作得了！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难道不能让我到别处贡献自己一点微弱的力量吗？就算不团结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一走开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吗？我不跟他们谈什么‘心’！我这一张嘴说不过他们！最好是走开了事！”

王书记一句话也没有插，让刘正把他的长篇讲话按